

# 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及其关系

王飞峰

三燕考古学和高句丽考古学长期以来都是东北亚地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及其关系研究也是其重要课题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三燕与高句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直接接壤，而且两者的莲花纹瓦当还显示出密切的关系。目前关于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特别是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时间各国学者观点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此笔者就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及其关系浅谈几点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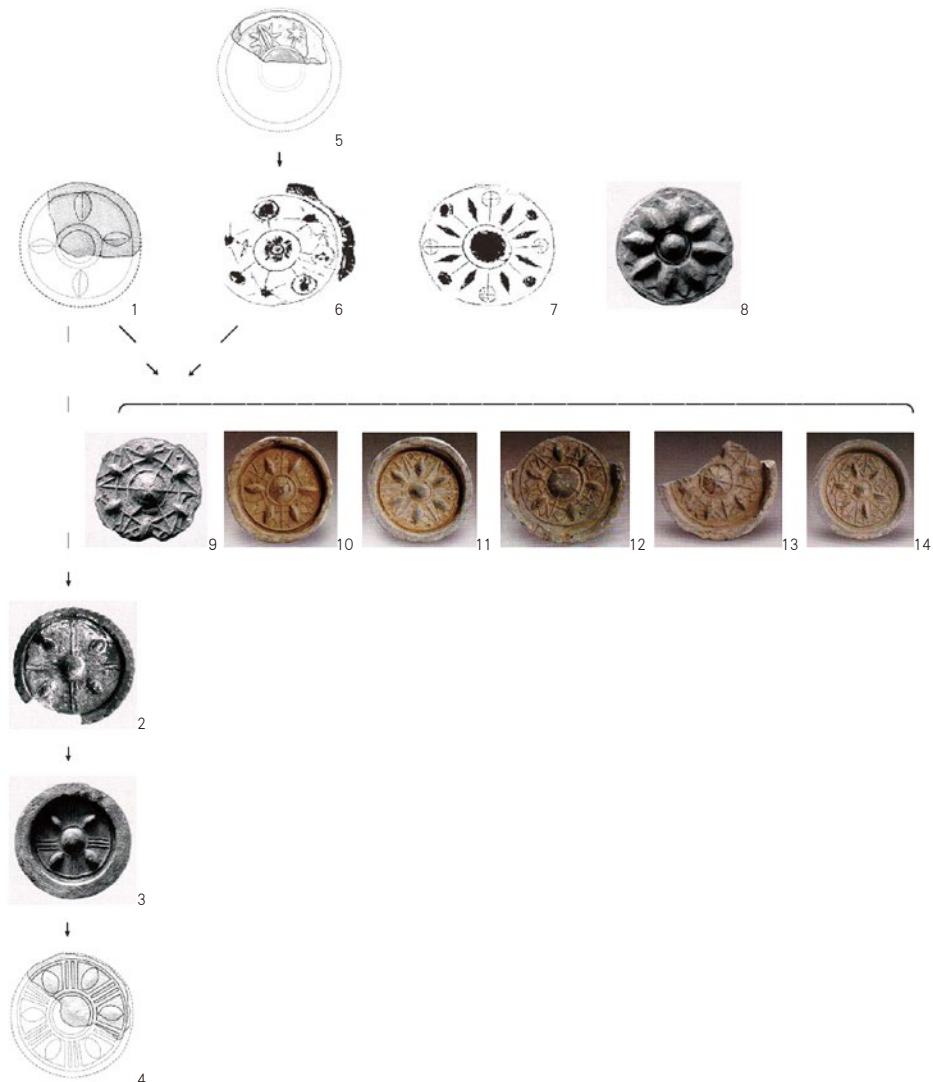
## 1. 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出现

佛教自东汉末年由西域传入中土，三国西晋时期得到了一定发展，东晋十六国开始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佛教进入东北地区的准确年代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最晚在前燕初期佛教已经在东北地区有了一定的发展。永和元年(345)，前燕慕容皝在龙城附近的龙山建立龙翔佛寺<sup>[1]</sup>，这是目前已知东北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也是佛教在前燕境内得到统治阶层认可的重要标志。作为佛教重要装饰纹样之一的莲花纹，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与中国古典建筑相结合，产生了一系列与莲花纹相关的纹样和建筑构件等，莲花纹瓦当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资料，可以确认莲花纹瓦当早在战国时代的建筑中已经使用；南北朝及其以后流行的莲花纹瓦当在莲花特点、当面莲花布局、当心变化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秦汉瓦当的影响<sup>[2]</sup>。也有学者认为尽管莲花纹瓦当早在战国秦瓦当中就已出现，但系用写实的手法对取材于现实生活的莲花进行艺术刻画，与南北朝时期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莲花纹瓦当，不仅形制、渊源不同，更重要的是赋予其中的意识观念，存在着天地之别<sup>[3]</sup>。十六国开始，特别是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莲花纹瓦当应当是受到佛教影响而出现的。三燕莲花纹瓦当同样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出现的，在讨论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出现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三燕莲花纹瓦当的认定和编年进行必要的说明。

三燕都城所在的龙城、蓟城、邺城和中山在三燕以后经历多次城市建设，三燕遗迹尤其是宫殿遗址确认难度较大，与三燕宫殿等建筑遗迹相关的考古工作不多，加之十六国时期能够对比的瓦当材料较少等因素一定程度上造成三燕瓦当的认定及编年相对困难。我们认为三燕瓦当的认定应从龙城、蓟城、邺城和中山四地及其附近地区着手，从已经发掘和出土的与三燕相关的遗物中寻找。三燕都城龙城及其周围的朝阳北大街<sup>[4]</sup>、朝阳北塔<sup>[5]</sup>及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sup>[6]</sup>等出土了一批与三燕相关的瓦当材料。蓟城(350—357年)和中山(385—397年)

作为前燕、后燕都城的时间不长，目前还没有发现与前燕、后燕有关的瓦当材料。邺城遗址已经发表的瓦当材料中有与朝阳和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出土瓦当相似的材料<sup>[7]</sup>，我们认为应是三燕时期的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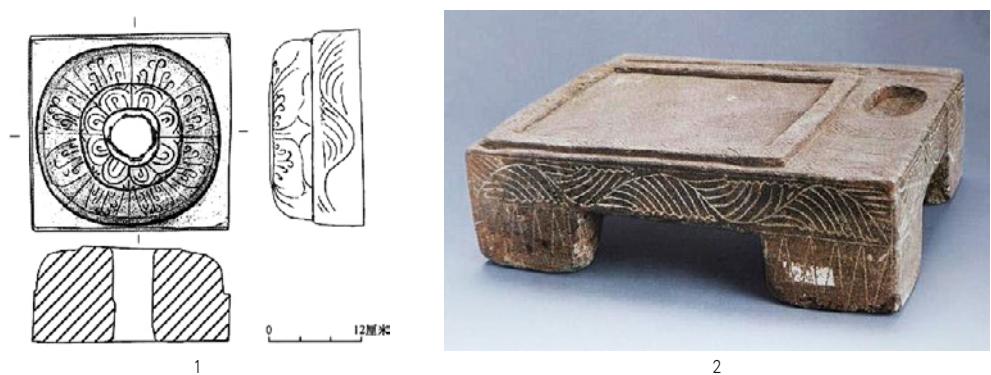
关于三燕莲花纹瓦当的类型及年代，笔者在《三燕瓦当研究》中曾有梳理，在此我们以《三燕瓦当研究》为基础对三燕莲花纹瓦当的类型、演变和年代做简单阐述。目前我们可以知道A型Ⅰ式(图一，1)和Ba型莲花纹瓦当(图一，5)在龙城遗址中均有发现，根据其形制判断可能是前燕龙城时期(341—350年)的遗物。A型Ⅱ式(图一，2)和Bb型莲花纹瓦当(图一，9—14)在龙城遗址和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等均有发现，其时代可能为后燕中山时期(385—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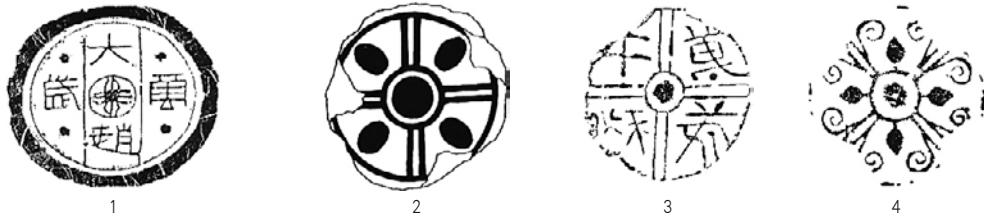
图一 三燕莲花纹瓦当发展演变图

年)。A型Ⅲ式(图一, 3)和A型Ⅳ式瓦当(图一, 4)在龙城遗址和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等均有发现, 其时代可能分别为后燕慕容熙时期(401—407年)、北燕时期(407—436年)。几何纹瓦当(图一, 6)和C型莲花纹瓦当(图一, 7)均为邺城遗址发现, 其时代可能是前燕邺城时期(357—370年)。D型莲花纹瓦当(图一, 8)仅在龙城遗址发现, 其时代可能在前燕迁都邺城(357年)之前。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在三燕瓦当的断代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遗址性质和年代的认定还存在一些差异。金岭寺发掘简报认为该建筑群应是前燕及前燕以前不久慕容部开始定居于辽西大凌河流域的一处早期高等级建筑遗存<sup>[8]</sup>。笔者认为该遗址是与后燕时期慕容垂“缮宗庙社稷”有关的考古遗存, 有网络状底纹的莲花纹瓦当可能为后燕中山时期、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应为慕容熙时期遗物<sup>[9]</sup>。田立坤先生认为此处建筑可能为前燕慕容皝时期修建的“慕容廆庙”, 但是对金岭寺建筑遗址出土的两类瓦当的时代并未作出说明<sup>[10]</sup>。由于后燕建国时的首都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并没有发现三燕时期的瓦当或遗物, 因此金岭寺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后定州市出土的后燕瓦当。即如果定州出土的瓦当与有网络状底纹的莲花纹瓦当相似, 那么金岭寺建筑遗址的最初修建年代为后燕慕容垂时期, 有网络状底纹的莲花纹瓦当应为后燕慕容垂时期, 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为后燕慕容熙时期; 反之, 如果定州出土瓦当与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相似, 那么金岭寺建筑最初的修建年代为前燕慕容皝时期, 有网络状底纹的莲花纹瓦当应为前燕时期, 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可能为后燕慕容垂时期。此外, 我们认为金岭寺建筑遗址发现的某些遗物表明该建筑群可能一直使用到北燕时期, 遗址曾出土一件浅灰色细砂岩质础石(图二, 1), 础石顶上饰八瓣莲花纹, 侧边阴刻水波纹, 其中水波纹不但与冯素弗墓出土的石砚(图二, 2)侧面纹饰较为相似<sup>[11]</sup>, 而且两者的质地均为细砂岩, 雕刻技法也大体一致。



图二 金岭寺遗址出土础石与冯素弗墓出土石砚  
1. 金岭寺遗址出土础石 2. 冯素弗墓出土石砚



图三 邺城遗址及抚顺地区出土瓦当

1. 邺城遗址“大趙萬歲”瓦当 2. 永陵南城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 3. 抚顺出土“千秋萬歲”瓦当 4. 抚顺出土卷云纹瓦当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前燕时期已经出现莲花纹瓦当，莲花纹瓦当中既有网络状底纹的莲花纹瓦当，也有无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和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特别是后二者成为以后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主要类型。A型 I 式和Ba型莲花纹瓦当的莲瓣中间有小短线，与此类似的莲瓣在后赵时期的“大趙萬歲”瓦当<sup>[12]</sup>（图三，1）上同样可以找到，因此三燕莲花纹瓦当中早期的莲花纹瓦当可能受到了后赵时期此类纹样影响。后赵时期佛教盛行，后赵地区出现的与莲花纹有关的瓦当无疑是佛教文化影响的结果。加之后赵曾与前燕直接接壤、交往密切，因此我们推测这一时期佛教可能由后赵传入前燕，并在前燕地区开始传播，到345年慕容皝建立龙翔佛寺时佛教在前燕境内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东北地区与三燕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类似的还有新宾县永陵南城出土的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sup>[13]</sup>（图三，2），日帝时代在修建抚顺市永安公园时曾出土了汉代的“千秋萬歲”瓦当（图三，3）和卷云纹瓦当<sup>[14]</sup>（图三，4），其中部分卷云纹瓦当的当面还饰有四个花叶纹，与此卷云纹瓦当相似的半瓦当在20世纪80年代永陵南城调查中也有发现<sup>[15]</sup>，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永陵南城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了“千秋萬歲”瓦当和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原报告称为图案瓦当并且认为是魏晋时期的莲花纹瓦当<sup>[16]</sup>）。因此我们认为新宾永陵南城出土的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应是当地文字瓦当——“千秋萬歲”瓦当与饰有花叶纹的卷云纹瓦当结合后的产物，可能并非我们认为的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传统意义上的莲花纹瓦当，至于其时代上限应晚于上述汉代的“千秋萬歲”瓦当和卷云纹瓦当。永陵南城出土的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制作规整、火候较高，与三燕瓦当相比有着明显区别，此类瓦当不但不属于三燕瓦当，而且还应是在慕容鲜卑占领这一地区之前制作完成的，因此其年代下限应不晚于慕容鲜卑占领辽东之时，即东晋太兴二年（319）<sup>[17]</sup>。所以三燕莲花纹瓦当中有界格线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应受到了永陵南城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的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三燕莲花纹瓦当出现于前燕迁都龙城之际（341年）或稍晚，不但是佛教传入前燕地区的直接产物，而且与慕容皝迁都龙城，兴建新都等活动有关。如咸康七年（341），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前曾安排阳裕、唐柱等修建龙城宫殿和宗庙等<sup>[18]</sup>。迁都龙城之后，除了巡视郡县，发展农业之外，慕容皝还增修了龙城宫阙<sup>[19]</sup>。

## 2. 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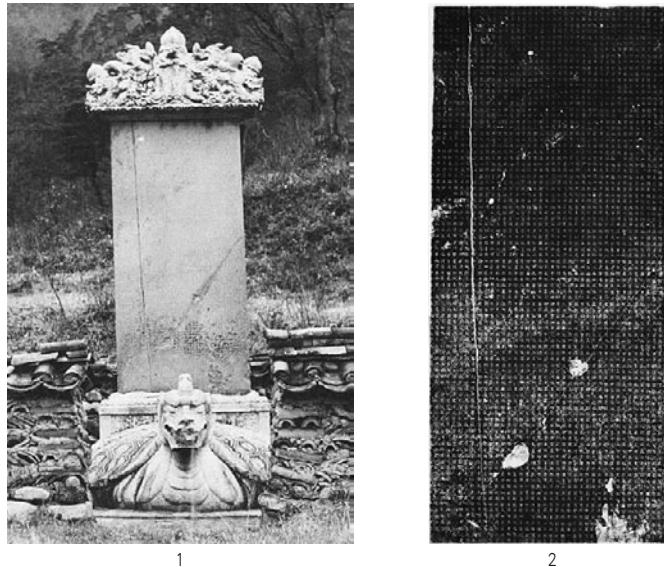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我们认为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的主要条件包括以下两点：一是佛教传入高句丽；二是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影响。其中三燕莲花纹瓦当对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的影响，下文将专门论述。此处重点讨论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及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等。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高句丽，目前研究者的意见并不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认为372年佛教由前秦僧人顺道传入高句丽<sup>[20]</sup>。二是根据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认为不晚于357年的4世纪中叶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地区<sup>[21]</sup>，甚至认为冬寿本人可能也是佛教信徒<sup>[22]</sup>。三是根据《高僧传》中支道林(314—366年)与“高丽道人书”的记载，认为“高丽道人”即是当时高句丽地区的佛教徒，因此在366年之前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地区<sup>[23]</sup>。四，根据《高僧传》《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等关于昙始的记载认为东晋太元二十年(太元为东晋孝武帝年号，376—396年，太元二十年即395年)佛教由东晋僧人昙始传入高句丽<sup>[24]</sup>。五，根据《高僧传》《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等关于昙始的记载、朝鲜半岛及高句丽地区发现佛像资料等认为佛教在东晋太元末期(约390—396年)由后秦僧人昙始传入高句丽<sup>[25]</sup>。其中第一种观点成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以上各种观点基本上是以目前可以见到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实质性的考古证据并不多，因此我们首先将对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

目前可以见到最早关于高句丽佛教传入的记录见于南朝梁代僧人慧皎(497—554年)撰写的《高僧传》，《高僧传·卷十·昙始传》：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丽闻道之始也。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sup>[26]</sup>。自慧皎撰《高僧传》以后，直到元代中国历代文献有关昙始的记录如《法苑珠林》<sup>[27]</sup>《北山录》<sup>[28]</sup>以及元代的《神僧传》<sup>[29]</sup>等均是以《高僧传》为基础，或是直接援引，或是稍加归纳，并无多大出入。

朝鲜半岛最早记录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文献当属统一新罗末期由著名学者崔致远(857—？年)撰写的《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全称《大唐新罗国故风岩山寺教溢智证大师寄照之塔碑铭并序》)。《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sup>[30]</sup>(图四，1、2)位于今韩国庆尚北道闻庆市加恩邑院北里凤岩寺，为韩国宝物第138号，碑高2.73、宽1.64、厚0.23米，螭首龟趺，碑阴末有“龙德四年岁次甲申六月口日竟建”的题记，龙德为五代时期后梁年号，龙德四年即924年<sup>[31]</sup>，该碑开始部分叙述了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过程。

第3列末段：昔当东表鼎峙之秋，有百济苏涂之仪，若甘泉金人之祀，厥后西晋昙始之貊，如，第4列上段：摄腾东入，句骊阿度度于我，如康会南行。崔致远虽然误将昙始所处的时代说成西晋，但是却记录了昙始入高句丽传法的事实。碑文中“昙始之貊，如摄腾



图四 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照片及正面碑文拓片  
1. 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 2. 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正面碑文拓片

东入”，即是说昙始到达高句丽，如同东汉明帝时到达洛阳的西域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一样，使得佛教开始在高句丽地区传播。唐代高句丽人也自称高句丽为貊，这一点可以从高句丽灭亡后居住在唐朝的泉男生之子泉献诚的墓志（大足元年，701年）中得到证明：君讳献诚，其先高勾骊国人也……公即襄公嫡子也。生于小貊之乡，早有大成之用，地荣门宠，一国罕俦<sup>[32]</sup>。

唐代道宣（596—667年）所撰《续高僧传·卷第二十六·释僧意传》有：释僧意……元魏中，住泰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于暮齿，精诚不倦。寺有高骊像、相国像、胡国像、女国像、吴国像、昆仑像、岱京像，如此七像并是金铜，俱陈寺堂，堂门常开，而鸟兽无敢入者，至今犹尔<sup>[33]</sup>。部分学者认为此处所述高骊像即高句丽佛像，此佛像为前秦时期（351—394年）高句丽赠送给竺僧朗的<sup>[34]</sup>。也有学者认为此处所述高骊像、相国像均为高句丽佛像，其中相国像可能是好太王时期（391—412年）高句丽“相国”赠送给竺僧朗的<sup>[35]</sup>。从目前高句丽地区的佛像资料来看，中国、朝鲜和韩国境内均有发现。中国学者1985年在国内城发现了一尊金铜佛像<sup>[36]</sup>（图五，1）。朝鲜发现的佛像资料较多，部分为1945年以前日本学者发掘高句丽佛寺（如平壤清岩里土城内的清岩里废寺址<sup>[37]</sup>、平安南道平原郡德山面元五里废寺址<sup>[38]</sup>等）的出土品或采集品，韩国发现的高句丽佛像<sup>[39]</sup>（图五，2）多为采集品。朝鲜半岛发现的佛像除首尔市纛岛发现的一尊金铜佛像<sup>[40]</sup>（图五，3）时代较早外，高句丽地区佛像资料的时代大体不早于5世纪初。虽然也有学者认为纛岛金铜佛像属于高句丽佛像，可能是5世纪初制造于中国北方地区<sup>[41]</sup>，韩国学者金元龙先生也认为纛岛佛像来自中国的可能性很高<sup>[42]</sup>，但佛像出土地周围均为百济墓葬和遗址，没有发现与高句丽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因此这件佛像



图五 国内城及朝鲜半岛发现金铜佛像  
 1. 国内城发现高句丽金铜佛像 2. 庆尚南道宜宁郡出土高句丽金铜佛像（延嘉七年，539年） 3. 首尔市纛岛发现金铜佛像

可能不属高句丽佛像。

因此参考包括慧皎《高僧传》在内的中国史料、崔致远撰写的《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及高句丽地区发现的佛像资料等我们认为高句丽佛教是在东晋太元末年(约390—396年)由后秦关中僧人昙始传入的，昙始当时可能是从关中出发由陆路到达辽西，经辽东进入高句丽。

就目前的考古资料而言，高句丽最早的瓦当为卷云纹瓦当，卷云纹瓦当消失之后出现了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和兽面纹瓦当等。出土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遗址主要有生活遗址和墓葬两大类，其中生活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的颜色多为红褐色，当面基本没有界格线；墓葬上出土的莲花纹瓦当颜色基本为灰褐色，当面多有界格线。莲花纹瓦当颜色的区别、界格线的有无与遗迹性质密切相关的特征在国内城时期的莲花纹瓦当产生之后较为显著，迁都平壤之后这些特征不再明显。

2004年出版的《丸都山城》<sup>[43]</sup>报告认为丸都山城宫殿址毁于342年前燕慕容皝攻破丸都山城的战火，说明发掘者认为最晚到342年高句丽已经出现了莲花纹、忍冬纹和兽面纹瓦当。日本学者田村晃一<sup>[44]</sup>、东潮<sup>[45]</sup>等，韩国学者金希灿<sup>[46]</sup>、白种伍<sup>[47]</sup>等认为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应是受到东寿墓莲花纹的影响而产生的，最早的莲花纹瓦当是太王陵发现的莲瓣上有“Y”字形(即莲蕾形莲瓣，笔者注)的双界格线六瓣莲花纹瓦当，时代大体在4世纪中晚期。也有学者认为在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中，有界格线的瓦当出现时代较早，产生于4世纪后半期，无界格线莲花纹瓦当的年代上限为6世纪初前半<sup>[48]</sup>。目前中国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遗

迹中均发现过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其中集安和平壤地区发现的莲花纹瓦当不但数量很多，而且形制复杂。国内城时期集安地区出土莲花纹瓦当的墓葬主要有千秋墓、太王陵、将军坟<sup>[49]</sup>、禹山M2112<sup>[50]</sup>和长川二号墓<sup>[51]</sup>、上活龙5号墓<sup>[52]</sup>等，出土莲花纹瓦当的遗址有国内城<sup>[53]</sup>、丸都山城<sup>[54]</sup>、东台子遗址和梨树园子南遗址<sup>[55]</sup>等。其他遗址和墓葬包括吉林省辽源市龙首山山城<sup>[56]</sup>、延边温特赫部城<sup>[57]</sup>、辽宁省抚顺市高台山城及附近的施家墓地<sup>[58]</sup>、新宾县五龙山城<sup>[59]</sup>、西丰县城子山山城<sup>[60]</sup>、辽阳市金银库遗址<sup>[61]</sup>和燕州城<sup>[62]</sup>、丹东市叆河尖古城<sup>[63]</sup>、凤城市凤凰山山城<sup>[64]</sup>、岫岩县娘娘山山城<sup>[65]</sup>、大连市大黑山山城<sup>[66]</sup>、盖州市青石岭山城<sup>[67]</sup>等。朝鲜境内发现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遗址多分布在平壤地区，主要有平壤城、大城山城<sup>[68]</sup>、长寿山城<sup>[69]</sup>、定陵寺<sup>[70]</sup>等，韩国境内发现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遗址有首尔市红莲峰1号堡垒<sup>[71]</sup>、峨嵯山城<sup>[72]</sup>和京畿道涟川市的瓠芦古垒<sup>[73]</sup>等。

就目前发现的莲花纹瓦当的形态和制作工艺等来看，集安地区的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其时代整体上应早于其他地区高句丽遗迹中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因此我们认为高句丽最早的莲花纹瓦当应该从集安地区的高等级遗迹如丸都山城宫殿址、东台子遗址、千秋墓等出土品中予以考虑。

丸都山城宫殿址，虽然报告认为其下限为342年，但是我们认为目前发掘的宫殿区可能是慕容皝攻破丸都山城之后好太王十七年(407)重新选择基址“增修宫阙”(《三国史记·卷第十八·广开土王本纪》：十七年春二月，增修宫阙)的结果，那么寻找丸都山城早期宫殿址及慕容皝烧毁的宫殿址也成为国内城时期高句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课题<sup>[74]</sup>。丸都山城瞭望台、各个门址发现的瓦当与宫殿址出土瓦当在颜色、胎体和纹样上也基本一致，那么这些瓦当中部分遗物应该是好太王时期的产物，整体上来看丸都山城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和兽面纹瓦当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好太王十七年(407)，下限为迁都平壤之时(427)。

东台子遗址为早年日本学者发现，关野贞较早对其进行了报道<sup>[75]</sup>，解放前部分遗址已被破坏。1958年吉林省博物馆对东台子遗址进行了发掘<sup>[76]</sup>，认为是高句丽时期一处重要的建筑遗址。1982年方起东先生<sup>[77]</sup>通过对东台子遗址规模和格局等的研究认为其是故国壤王九年(392)三月修建的国社和宗庙遗迹。2010年韩国学者姜贤淑<sup>[78]</sup>通过对东台子遗址出土遗物等的研究，认为东台子遗址的时代在5世纪末以后、渤海灭亡之前。笔者在对东台子遗址出土遗物、相关遗迹和文献等系统梳理后认为东台子遗址是故国壤王八年(391)<sup>[79]</sup>三月下令修建的国社和宗庙，但是当年五月故国壤王就已去世，可能由于当时的建筑并未最终完成，也就没有使用瓦当，如果故国壤王时期修建的国社和宗庙使用瓦当，我们认为应是与千秋墓上发现的卷云纹瓦当类似的瓦当<sup>[80]</sup>。那么东台子遗址出土的大量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和兽面瓦当并非故国壤王时期的遗物，应是好太王时期在修缮时使用的瓦当，部分瓦当与丸都山城宫殿址发现的瓦当纹样相同或类似，甚至两个遗址之间还存在着同范瓦当，所以说东台子遗址部分莲花纹瓦当的年代应与丸都山城的同类出土品一致<sup>[81]</sup>。

2003年在千秋墓出土一件刻有“永乐”铭文的筒瓦<sup>[82]</sup>（图六，1、2），泥质灰陶，残长13、宽15.5、厚1.5厘米。筒瓦凸面残留两列铭文，共计8个字，《集安高句丽王陵》报告给出了释文，右列：（乐）浪赵将军，左列：口未在永乐。但是也有学者释为：（乐）浪赵将军，口夫任永乐<sup>[83]</sup>。从筒瓦上所留的字形和文义来看，报告给出的释文较为可信，而且报告还认为这是好太王时期为千秋墓修陵所用的瓦件，并根据好太王在位年代（391—412年）推测左列的铭文为：（乙或丁）未在永乐。我们通过对高句丽的葬俗及筒瓦上“未”字上一字残存字形等的研究认为其铭文为“（乐）浪赵将军”、“（丁）未在永乐”<sup>[84]</sup>。好太王碑第四面第7—9列有“自上祖先王以来，墓上不安石碑，致使守墓人一烟户差错，惟国罿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尽为祖先王墓上立碑，铭其烟户不令差错。又制：守墓人自今以后，不得更相转卖，虽有富足之者，亦不得擅买，其有违令，卖者，刑之。买人，制令守墓之”。说明好太王时期不但制定了一系列与守墓制度有关的律令，而且还曾经在“祖先王墓”上立碑，在立碑的同时对部分陵墓进行修缮也在情理之中。千秋墓出土的瓦当中既有高句丽卷云纹最晚阶段的无铭文卷云纹瓦当，又有莲花纹瓦当，千秋墓发现的双界格线六瓣莲花纹瓦当与太王陵、将军坟的同类瓦当相比较，表现出较早的特点<sup>[85]</sup>。因此在集安地区的王陵中千秋墓是高句丽卷云纹瓦当消失、莲花纹瓦当出现的具有分界线性质的陵墓，由于在千秋墓上发现了可能为“丁未”的铭文筒瓦，所以我们认为好太王在丁未年（407）修缮了父亲故

国壤王的陵墓，使用了双界格线六瓣莲花纹瓦当，那么这些瓦当的年代也应该不晚于407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集安地区当时高句丽的王宫遗址（丸都山城宫殿址）、国社和宗庙遗址（东台子遗址）和王陵（千秋墓）这些高等级遗迹上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出现时间应不晚于好太王时期的丁未年（407）。集安地区的其他遗址和墓葬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其出现时间也不会早于上述三个遗迹的莲花纹瓦当的年代。因此我们认为高句丽最早的莲花纹瓦当首先出



图六 千秋墓发现“永乐”铭文筒瓦照片及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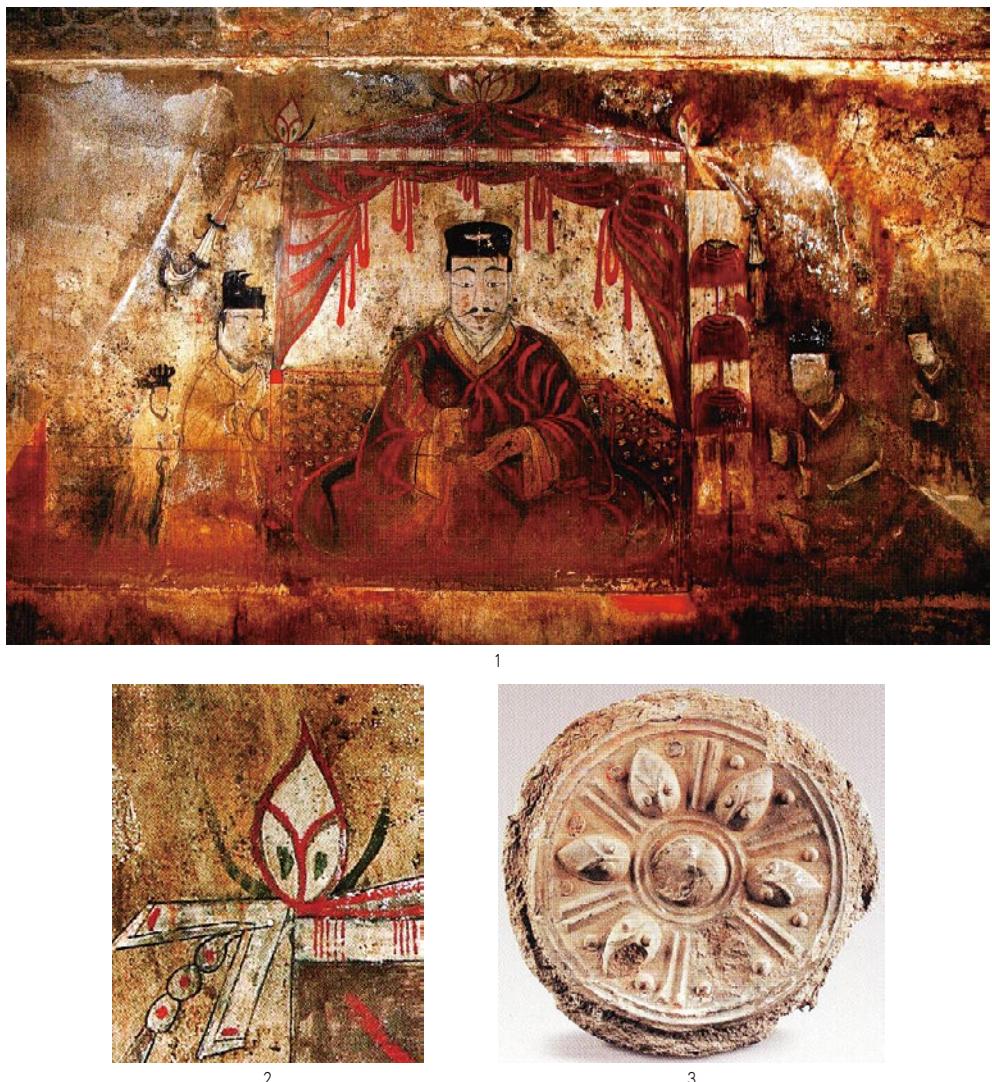


图七 大黑山山城出土瓦当、当沟与集安地区发现瓦当、当沟

1. 大黑山山城发现莲花纹瓦当 2. 东台子遗址出土莲花纹瓦当  
3. 大黑山山城发现当沟 4. 丸都山城宫殿址发现当沟 5. 将军坟西南建筑址出土当沟

现于集安地区，包括当时高句丽的国社和宗庙、宫殿和王陵等遗迹，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太元之末(约390—396年)后秦僧人昙始将佛教传入高句丽地区。佛教的传入对高句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高句丽墓葬壁画中的莲花纹作为一种具有佛教含义的装饰纹样开始“爆炸式”的出现，一直使用到高句丽灭亡。

而大黑山山城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和斜方格纹当沟也可以为我们上述的推测提供佐证。大黑山山城位于大连市金州区大黑山山顶，平面呈不规则形，周长约5000米，城内曾采集到“卑沙”“毕奢”等铭文陶片<sup>[86]</sup>。城内还发现有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和斜方格纹当沟，现收藏于旅顺博物馆，莲花纹瓦当(图七，1)<sup>[87]</sup>的纹样和莲瓣形态等与东台子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图七，2)<sup>[88]</sup>较为相似，斜方格纹当沟(图七，3)<sup>[89]</sup>与丸都山城宫殿址(图七，4)<sup>[90]</sup>、将军坟西南建筑址(图七，5)<sup>[91]</sup>发现的同类器物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瓦在高句丽时期是一种具有身份和等级象征的标志物，《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有：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和王宫、官府乃用瓦<sup>[92]</sup>。大黑山山城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和当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反映了高句丽对辽东地区的一种宣示。高句丽最初占据辽东地区始于故国壤王二年(385)六月对辽东郡和玄菟郡的侵占，但是同年十一月就被后燕将领慕容农收复<sup>[93]</sup>。至400年时，后燕尚有势力大举进攻高句丽，曾拔高句丽新城、南苏二城，拓地七百余里<sup>[94]</sup>。402年，高句丽进攻宿军，导致后燕平州刺史慕容归逃走<sup>[95]</sup>。404年，高



图八 冬寿墓莲花纹及太王陵莲花纹瓦当  
1. 冬寿墓墓主人坐帐 2. 冬寿墓坐帐上的莲瓣形莲瓣 3. 太王陵出土莲瓣形莲瓣的莲花纹瓦当

句丽攻燕<sup>[96]</sup>。金毓黻先生认为在这一年高句丽最终占领辽东，在《东北通史》中有：考高句骊于晋太元十年六月，初陷辽东、玄菟二郡，至是年十一月底，燕复二郡，是即高句骊故国壤王二年（385）也。又后十九年为晋元兴三年，而辽东再陷，玄菟郡亦同时沦陷，是即广开土王之十四年（404），而终至于不能复，直至唐高宗总章元年（668）灭高句丽之日，辽东之故地始复，然已沦陷二百六十五年，可谓久矣<sup>[97]</sup>。大黑山山城莲花纹瓦当和当沟的出现同样也为金毓黻先生的说法提供了考古学证据，这些器物的年代应是在高句丽占领辽东之后不久，其上限则是晋元兴三年（好太王十四年，404）以后的一段时间，但是不应早于好太王时期

的丁未年(407)，下限则是高句丽迁都平壤之时(427)。

大黑山山城作为目前发现的辽东半岛最南端的一座高句丽山城，雄踞大黑山山巅，扼守大连湾地区，是高句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军事据点。隋唐时期进攻高句丽，从山东半岛浮海而来的隋唐军队在这一地区首选的进攻地点就是大黑山山城<sup>[98]</sup>。好太王作为高句丽中期的一代国王，武功赫赫，功勋弥高，当然会意识到大黑山山城的重要性，一方面在城中使用瓦当和当沟这样的器物来表明山城的地位，一方面也不排除暗含着向先王、先祖乃至后燕彰显武功的含义。

冬寿墓中发现的莲花纹特别是冬寿坐帐两角出现的莲蕾形莲花<sup>[99]</sup> (图八，1、2)与太王陵上发现的莲蕾形莲花纹瓦当<sup>[100]</sup> (图八，3)的莲蕾形态比较接近，这也成为诸多学者认为太王陵发现的此类瓦当是高句丽最早莲花纹瓦当的重要依据。冬寿夫妇的坐像均位于帷帐之内，以帷帐作为随葬品的习俗，从战国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sup>[101]</sup>。墓主人坐于帐中的形象则流行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壁画中，以莲花、龙头和流苏等装饰帐盛行于十六国北朝时期，《邺中记》有：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头衔五色流苏。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囊。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石窟也发现帐角用龙装饰的现象<sup>[102]</sup>。冬寿墓的坐帐，帐顶装饰莲花，帐角装饰莲花、璜和流苏，与辽阳上王家晋墓<sup>[103]</sup>发现的男主人坐帐十分相似。因此我们认为冬寿墓墓主人位于坐帐内的形象实际上是利用辽西地区魏晋壁画中的某些片段为粉本，同时还存在着根据墓主人身份等对粉本进行选择、组合和改造的情况，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并不代表当时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只是代表一种装饰和纹样，一个粉本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04]</sup>。

### 3. 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关系

关于三燕莲花纹瓦当和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关系，虽然各国学者都认为二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对于影响与被影响的主体和客体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高句丽莲花纹瓦当是在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影响下产生的，以中国学者李新全<sup>[105]</sup>、王飞峰<sup>[106]</sup>等，日本学者桃崎祐辅<sup>[107]</sup>等为代表；二是三燕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受到了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影响，以韩国学者姜贤淑<sup>[108]</sup>等为代表。本文分析了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的时间和背景，我们发现从时间上来看，三燕莲花纹瓦当产生的时间明显早于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时间，可能在北燕时期(407—436年)莲花纹瓦当被文字瓦当取代；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时间不晚于好太王十七年(407)，一直使用到高句丽灭亡；因此从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而言，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不会影响到三燕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和发展，而三燕莲花纹瓦当则会影响到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和发展。从瓦当的系谱来看，三燕莲花纹瓦当中，既存在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也有无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而且从这两类莲花纹瓦当的演变规律来看，莲瓣数量和界格线数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这些特征与国内城时期高句丽

莲花纹瓦当中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无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发展演变的特点完全一致。从三燕和高句丽遗物的关系来看，高句丽墓葬壁画的纹样和布局、武器、马具和甲胄等诸多方面均受到三燕文化的强烈影响，某些器物如用于战争的铁镞、防护装备的甲胄、驾驭马具的衔和装饰用的步摇形云珠，高句丽遗物均受到三燕同类器物的影响，甚至达到了难分彼此的程度。从当时的人员交往情况来看，二者之间交往频繁，前燕时期高句丽曾臣服于前燕，而且从前燕时期开始，就有前燕人如冬寿、郭充等逃往高句丽。因此我们认为从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瓦当的系谱、三燕和高句丽交流等情况来看，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和发展均受到了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影响。

#### 4. 结语

三燕莲花纹瓦当作为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莲花纹瓦当，其产生于前燕迁都龙城（341年）后不久，在营造龙城的过程中大量被使用，北燕时期可能被文字瓦当（“富貴萬歲”）取代。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于国内城地区，首先在王陵和高等级遗迹中开始使用，其产生时间应不晚于好太王十七年（407）。值得注意的是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实际控制了辽东半岛以后，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黑山山城也出现了高句丽早期莲花纹瓦当和当沟，显示了大黑山山城的特殊意义。三燕莲花纹瓦当、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均是在佛教传入上述地区之后在佛教的直接影响下出现的，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和发展受到了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影响，特别是三燕莲花纹瓦当中的无界格线莲花纹瓦当和有界格线莲花纹瓦当，成为以后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重要类型。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6年度重大课题（16ZDA149）阶段性成果。

#### 注

- [1]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825—2826页：时有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此事即345年慕容皝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建立龙翔佛寺，史称“龙见立寺”。本文所用正史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不再赘述。
- [2] 刘庆柱：《关于中国古代莲花纹瓦当图案渊源考古研究》，《고대 동아시아의 기와》，한국기와학회，2008년。
- [3] 戈父（编著）：《古代瓦当》，第179页，中国书店，1997年。
- [4] 万雄飞、白宝玉：《朝阳老城北大街出土的3—6世纪莲花纹瓦当初探》，《东北亚考古学论丛》，第61—66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 [5] 朝阳市北塔考古勘察队、朝阳市北塔维修办公室：《朝阳北塔1986—1989年考古勘察纪要》，《辽海文物学刊》，第15—23页，1990年第2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 [6] 辛岩、付兴胜：《金岭寺魏晋建筑群址为研究三燕文化提供重要线索》，《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31

日第1版。辛岩、付兴胜、穆启文：《辽宁北票金岭寺魏晋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辽宁考古文集》（二），198—224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本文所用金岭寺相关材料均出自该报告。

[7] 焦智勤：《邺城瓦当分期研究》，《殷都学刊》，第43—54页，2007年第2期。其中第52页图二十一、二十二的莲花纹瓦当与金岭寺遗迹出土材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笔者认为是前燕都邺城时期的瓦当。

[8] 辛岩、付兴胜、穆启文：《辽宁北票金岭寺魏晋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

[9] 王飞峰：《三燕瓦当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10] 田立坤：《金岭寺建筑址为“庵庙”说》，《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11] 本文图二：2引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燕文物精粹》，第122页，图166，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 本文图三：1引自焦智勤：《邺城瓦当分期研究》，《殷都学刊》，第43—54（52）页，图二十九：1，2007年第2期。

[13] 本文图三：2引自高橋匡四郎：《蘇子河流域に於ける高句麗と後女眞の遺跡》，《建国大学研究院研究期報》，第三一図，1941年第二号。

[14] 本文图三：3、4引自渡邊三三、斎藤武一：《満洲國撫順の古瓦に就て》，《考古學雑誌》第二十九卷第一一號，第667—690（670），第二圖：2、6，1939年。

[15] 徐家国：《辽宁新宾县永陵镇汉城址调查》，《考古》，第1049—1051页，1989年第11期。

[16] 李新全、苏鹏力：《辽宁新宾永陵南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第187—188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17] 《晋书·卷六·元帝纪》，第151—155页：（大兴）二年（319）……八月，肃慎献楨矢石砮……十二月乙亥，大赦，诏百官各上封事，并省众役。鲜卑慕容廆袭辽东，东夷校尉、平州刺史崔燄奔高句丽。三年……三月，慕容廆奉送玉玺三组。……四年……十二月，以慕容廆为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平州牧，封辽东郡公。通过以上史料可以知道大兴二年（319）慕容廆袭击辽东成功，导致当时的东夷校尉、平州刺史崔燄逃亡高句丽，此时慕容鲜卑已经实际控制了包括今永陵南城在内的辽东地区，至大兴四年（321），慕容廆占领辽东地区最终得到了东晋朝廷的认可。

[18] 《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第2821—2822页）：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咸康七年，皝迁都龙城。

[19] 《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第2822页）：皝躬巡郡县，劝课农桑，起龙城宫阙。

[20] 魏存成：《高句丽考古》，第74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裕群：《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第23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以下称《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李乐营：《佛教向高句丽传播路线的探析》，《社会科学战线》，第124—126页，2008年第11期。陈明华：《韩国佛教美术》，第20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国内学者、朝鲜半岛学者及日本学者也多持此观点。

[21] 梁志龙：《高句丽儒释道三教杂论》，《北方文物》，第88—94页，2004年第2期。

[22] 吴焯：《从向邻国的政治关系看佛教在朝鲜半岛的初传》，《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3] 温玉成：《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北方文物》，第32—38（70）页，2001年第1期。李海涛：《佛教在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传播足迹考》，《全球化下的佛教与民族》（第三届两岸四地佛教学术研讨会），第501—51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

[24] 日·木村宣彰（著），姚义田（译）：《昙始与高句丽佛教》，《博物馆研究》，第38—44页，2002年第2期。

[25] 王飞峰：《冬寿墓莲花纹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26]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

[27] 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三十一·昙始传》，第956页，中华书

局, 2006年: 宋伪魏长安有释昙始, 关中人。自出家以后, 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 贲经律数十部, 往辽东宣化, 显授三乘, 立以归戒, 盖高句骊闻道之始也。义熙初, 复还关中, 开导三辅。

[28] 唐·神清(撰)、宋·慧宝(注)、宋·德珪(注解)、富世平(校注):《北山录校注·卷三·昙始传》, 中华书局, 第203页, 2014年:晋昙始, 孝武末(东晋也), 帝临位, 深奉佛法, 荷坚兵至, 谢玄破也)适辽东, 高丽开导始也。后还三辅(三辅, 咸阳县, 昔秦皇于此置殿观), 三辅人宗仰之。

[29] 元·无名氏(撰):《神僧传·卷二·昙始传》:释昙始, 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 贲经律数十部, 往辽东宣化, 显授三乘, 立以归戒。义熙初, 复还关中, 开导三辅。

[30] 本文图四: 1、2 分别引自成均馆大学校 박물관:《新羅金石文拓片展》, 成均馆大学校 박물관, 第121页图、第119—120页图, 2008년。

[31] 龙德为后梁末帝朱友贞的年号, 仅仅使用了三年, 即921—923年, 此碑的龙德四年笔者暂定为924年。

[32]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 第984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

[33]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 第993页, 中华书局, 2014年。

[34] 《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 第233页。

[35] 温玉成:《高句丽“相之国”》,《北方文物》, 第67(112)页, 2004年第3期。

[36] 本文图五: 1 引自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编著):《集安出土高句丽文物集萃》, 第101页, 科学出版社, 2010年。以下称《集安出土高句丽文物集萃》。

[37] 小泉顯夫:《平壤清岩里廢寺址(概報)》,《昭和十三年度古蹟調查報告》, 朝鮮古蹟研究會, 1940年。

[38] 小泉顯夫:《泥佛出土元五里廢寺址の調査》,《昭和十二年度古蹟調査報告》, 朝鮮古蹟研究會, 1938年。

[39] 本文图五: 2 引自菊竹淳一、吉田宏志(编):《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0·高句麗·百濟·新羅·高麗》, 小學館, 图版81, 1997年。

[40] 本文图五: 3 引自國立中央博物館:《三國時代佛教彫刻》, 國立中央博物館, 第121页, 图102, 1990年。

[41] 《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 第235页。

[42] 金元龍:《蘆島出土金銅佛坐像》,《歷史教育》1961년 제 5집。

[4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都山城》, 文物出版社, 2004年。

[44] 田村晃一:《樂浪と高句麗の考古学》, 同成社, 2001年。

[45] 東潮:《高句麗考古学研究》, 吉川弘文館, 1997年。

[46] 희찬:《4 세기 고구려 연화문와당의 개시연대에 대한 고찰》,《韓國思想과文化》제45집, 2008년。

[47] 백종오:《고구려 기와의 성립과 왕권》, 주류성, 2006년。

[48] 千田剛道:《瓦からみた高句麗古都集安》,《青丘学術論集》, 1994年第5集。

[49]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集安高句丽王陵》, 文物出版社, 2004年。以下称《集安高句丽王陵》。池内宏:《通溝》(上), 日滿文化協會, 1938年。以下称《通溝》等。

[50] 集安市博物馆:《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2112号墓》,《北方文物》, 2004年第2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集安禹山M2112墓室清理简报》,《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报告集》, 第292—299页, 科学出版社, 2009年。

[51] 耿铁华、尹国有:《高句丽瓦当》,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158页, 2001年, 以下称《高句丽瓦当》。

[52]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上、下和龙高句丽古墓清理简报》,《文物》, 1984年第1期。

[5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国内城》, 文物出版社, 2004年。。

[54]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都山城》, 文物出版社, 2004年。以下称《丸都山城》。

[55] 《集安县文物志》编写组:《集安县文物志》,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1984年。《高句丽瓦当》等。

[56] 王洪峰等:《辽源市文物志》, 吉林省文物志编辑委员会, 1988年。

[57] 延边博物馆《延边文物简编》编写组:《延边文物简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1988年。

[58] 渡邊三三、斎藤武一：《満洲國撫順の古瓦に就て》，《考古學雑誌》第二十九卷第一一號，1939年。

徐家国、孙力：《辽宁省抚顺高爾山城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三上次男、田村晃一：《北関山城-高爾山山城：高句麗新城の調査-》，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9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抚顺市博物馆：《辽宁省抚顺市施家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0期。《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编辑委员会：《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上)》，第258—259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年，以下称《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上)》或《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等

[59] 佟达：《新宾五龙高句丽山城》，《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

[60] 周向永：《西丰城子山山城始建年代再考》，《东北史地》，2009年第2期。周向永、许超：《铁岭的历史与考古》，辽海出版社，2010年。

[61]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第301页。

[62] 苏鹏力：《灯塔市燕州城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0)，第195—196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63]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上)》，第249—250页。

[64] 崔玉宽：《凤凰山山城调查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李龙彬、华玉冰、崔丽萍：《辽宁丹东凤凰山山城首次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3月23日。李龙彬、司伟伟、崔丽萍：《辽宁丹东凤凰山山城考古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2月15日。《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上)》，第255页。

[65] 杨永芳、杨光：《岫岩境内五座高句丽山城调查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

[66] 郭富纯、赵锡金(主编)：《大连古代文明图说》，第24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

[6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盖州市文物局(王飞峰等)：《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的調查与发掘》，《考古》，2017年第12期。

[68] 김일성종합대학 고고학및민속학강좌：《대성산 일대의 고구려 유적에 관한 연구》，김일성종합대학출판사，1973년。

[69] 石光濬：《高句麗考古学の新しい成果》，《古代朝鮮の考古と歴史》，雄山閣，2002年。

[70] 김일성종합대학：《동명왕릉과 그 부근의 고구려유적》，김일성종합대학출판사，1976년。

[71] 崔鐘澤、李秀珍외：《紅蓮峰第1堡壘—發掘調查綜合報告書—》，高麗大學校考古環境研究所，2007년。

[72] 2016年9月7日在峨嵯山城的发掘中发现与红莲峰第1堡垒出土瓦当纹样相同的莲花纹瓦当，见강승현(기자)：《아차산성서 고구려 유물 “연화문와당” 발견》，《동아일보》，2016년 9월 8일。

[73] 심광주외：《漣川瓠蘆古壘III》(第2次發掘調查報告書)，한국토지공사 토지박물관，2007년。

[74] 王飞峰：《丸都山城宮殿址研究》，《考古》，2014年第4期。

[75] 關野貞：《満洲輯安縣及び平壤附近に於ける高句麗時代の遺跡》(二)，《考古學雑誌》第五卷第四號，1924年。

[76]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清理》，《考古》，1961年第1期。

[77] 方起东：《集安东台子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东北考古与历史》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78] 姜賢淑：《中國吉林省集安東台子遺蹟再考》，《한국고고학보》 제75집,한국고고학회，2010년。

[79] 《三国史记·卷第十八·故国壤王本纪》(第223页)：九年(392)……三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命有司立国社，修宗庙。由于《三国史记》所记故国壤王年代为384—392年，实际上依据好太王碑资料故国壤王年代为384—391年，因此笔者倾向于东台子建筑为故国壤王八年(391)高句丽的国社和宗庙遗迹。由于《三国史记》在故国壤王纪年问题上多出一年，因此本文在引用故国壤王及好太王年代时均做了调整。

[80] 王飞峰：《关于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的几个问题》，《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